

经济学隐喻实践合理性的“后现代”考察

祁大为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太原 030006)

摘要:“不确定性问题”长期困扰着经济学发展。将经济学隐喻用于实践,其兼具的解释力使研究者应对“不确定性问题”的挑战时不但揭示了经济世界的真相,还呈现出经济学研究者对知识真理性的追逐进程。对经济学隐喻的实践优越性进行后现代维度解读,不仅可以视为对经济学研究中“客观性危机”的化解方案,而且可以让我们对经济学研究可能前景的领会得到深化。

关键词: 经济学隐喻; 后现代哲学; 解释; 真理性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062(2020)04-0054-07

在说明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世界本质善变问题上,尽管经济学家和方法论者都付出过艰辛的努力,可取得的成果却无法令人满意。众所周知,作为公认相对成熟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其研究方法就一直受到演绎主义认识论的影响。在经历了始于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学方法论多元化发展阶段,事实表明,演绎主义以及规定性研究策略已不能适应实践经济学家实际研究的需要了。这是因为“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既不能对事件做出具体的预测,也不能说明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1],这使得经济学家在类似预测经济事件和辅助制定经济政策等的实践中,遭遇不确定性问题的干扰或挑战越来越多。我们知道,经济学理论本身素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隐喻系统加工和塑造形成的,经济学隐喻蕴含的语言、概念、思维之间的理解、交流和相互转换,在研究者的实践中施加给了作为对象之一的理论世界,这不仅使经济学隐喻成为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构成要素,在研究者的实践中也展现出了其特有的理解和解释属性。将经济学隐喻用于实践,这无疑会为研究者在经济世界与经济学之间建构一座新“桥梁”。受此启发,假如我们将经

济学隐喻作为研究实践的另一路径,那么其自身的实践属性如何体现,该属性又何以可能,或者说其实践的理由抑或实践的基础是否可以经受批判意识浓厚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体系的考察,于是就成了经济学隐喻作为实践方式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重要依据。

另一方面,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有关实践意义问题最具影响力的探讨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个方向是主张哲学科学化,着重于数理逻辑与语言关系的发现及分析,其代表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不要问意义,要看使用,是他对语言实践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更关注日常语言说明力的讨论。另一方向是解释学领域的一系列研究,其杰出代表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海德格尔看来,实践主要是指本真的“我”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透彻领会,通常被认为是实践的解释学。但是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这里,哲学家们更关注人生活的现实世界,倾向在现实生活中理解人的实践,尤其是对隐喻运用的看法愈加接近其“用具”潜能的自涌及其在历史的时间进程中与真相的相遇。本质上看,“后现代”视域中的隐喻实践越来越“地方化”,以至于变成一种有关“权力”获取

【收稿日期】 2019-11-21

【基金项目】 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山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平台的团队建设研究”(2018041047-3);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脑的本质与现代认知观研究”(18JJD720004);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新趋势研究”(201604002)

【作者简介】 祁大为(1980-),男,河北平泉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

的重要方式。鉴于此,我们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隐喻的实践研究中,这不仅可以使我们在面对“不确定性问题”时有了新思路,同时这也是依据我们所处境况对经济世界真相进行的理解和解释实践。

一 经济学隐喻作为自主运动的实践

我们都知道,后现代主义哲学将反对科学主义作为其主要任务之一,对科学研究中因果意义上的确定性实践思路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后现代”代表了不同于科学精神的文化经验和科学观念,并认为科学真理的标准同样不可避免地依赖历史文化语境。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看来,知识无论如何不同于智慧,科学也不同于思想,借助于实践过程中的审美、历史和语言才可能走出绝对真理的阴影。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在经济学隐喻的言说实践中,一切言语都能够以特定方式逐步地归结为实践。因此,经由“后现代”思路来考察经济学隐喻的实践属性,理由如下。

首先,经济学隐喻的非确定性表达及交流是出于现实的逼迫。确定性知识长久以来都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诉求之一,这使得很多经济学者一直把确定性假定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从确定性视角出发并对不确定性因素加以认识,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无疑是为我们提供了主观概率工具的贝叶斯(Thomas Bayes)。而经济学家借助于贝叶斯定理实现了在给定有效度量结果的前提下,将某一时段经济世界所有可能状态的概率预测过程,置于严格数学考察的基础上。不过,面对不确定性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我已经以多大的频率观察到了世界处于状态 x ,当前的经验数据与世界确实处于状态 x 的关系如何,如果这些方面的知识都给定时,那么精确地说世界到底有多大可能真的确实处于状态 x 呢?”^[2]

虽然贝叶斯的诸多概率统计技术被沿用至今,但问题是,这种就不确定性事件的认识方式仍旧没能超出经验界。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对数学工具的依赖,作为一种具有实践属性的研究思路,经济学隐喻对研究者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作为最一般的言说工具,经济学隐喻使研究者获得了脱离确定性研究路径的可能。隐喻本身并不能决定自己的用途,这意味着隐喻使经济学者获得了更多的选择自由。依托当下语境,研究者具备了针对经济现象多样化的表达方式,相较于传统研究“工具”,这使得研究者的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得以缓解,有关社会经济的研究会由此更加趋向多样化。其二,经济学隐喻有效促进了研究者社会交往的多元化。经济学者和经济活动主体运用包括言说、书写甚至参与学术或民间争论等各类交往活动,可以使共同体内外保持有效沟通,这无疑会增加经济交往样态及其形式和内容的多元化。其三,经济学隐喻是对数学工具的继承和超出。经济学者对纯粹数学工具的运用,使得他们易于对经济主体和经济现象进行处理的同时,却导致了经济活动主体愈加脸谱化以及经济世界“扁平化”。不过,现实情况并非全然如此。如果我们将经济学隐喻运用于研究实践的话,研究者可以在保留可用数学工具的前提下,把描述性和规范性的隐喻用法纳入经济活动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中,如此便在主体逐利活动中融入了人的本性和人的自身价值。与“经济人”只存在于利益基础上的数量计算相比,人文文化的真理性及人存在的意义由此就能够在经济活动和研究活动中得到彰显。

其次,经济学隐喻兼具了非理性解释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中很多人都深受库恩(Thomas Kuhn)思想的影响,库恩范式理论如果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将会发生巨大变化。这是因为,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出发,将不会有从整体上与人的认识相脱离的事实世界,事实均由某些范式决定。实际上,库恩试图把自然科学或者实证科学也解释学化,进而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界限消除。同样地,库恩的思路对我们理解经济学和经济世界的关系也具有巨大的启发性。进一步来看,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由于受到“科学革命”的影响,他们的哲学中不再有“古典意义上的事实”,所有事实都是在某种框架内被确定的,这种框架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看来即是解释。我们都知道实证科学的知识是关于客观事实的知识,与实证科学这一知识获取方式相对的是解释学,对于哲学解释学来说,事实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它只是一种基层性的或者说只是其研究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并不是哲学解释学要探讨的核心内容,因为意义才是重要的。这恰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说:没有事实,只有解释。

“解释理论与隐喻理论之间存在着某些关联,而且这些关联是现实的。原因在于隐喻像文本一样,可以在话语的框架内对之进行分析。”^[3]主流经济学家大都运用科学理性来尝试把握研究对象自身的某些机制或规律,通过经济学发展历程我们了解

到经济关系绝不止于纯粹“经济人”之间的关系,活动主体的信念、价值、选择偏好甚至偏见都在影响着我们对经济世界可能的确定性认知。鉴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研究策略屡屡在实践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受挫,更不能回答人投身于经济生活的意义问题,因此,如果我们从文化的多元化视角出发,借助于隐喻话语对经济世界真理性存在的持续性描述,经济世界的奥义方有可能逐渐变得清晰可理解。

最后,实践力是经济学隐喻自身结构张力的释出。后现代主义哲学明确反对在社会世界中找寻一般性定律或规则,以及使其形式化或科学化的做法。此种做法“首先便是回避掉了所谓对象‘幕后’的因果机制、本质、必然性以及潜能(capacity 主要指内在于因果事实中的能力)等概念,只是为了将因果律看作是经验事件中规则的普遍性陈述。其次,科学的普遍性因果断言不是关于规律性的总结,而是概念系统本身潜能和本质的一种理解,这种能力和本质进一步来说就是关于内在于因果力中的潜在能力。最后,即便是在科学研究中,这种来自概念系统的潜能远比规律基本”^[4]。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实际研究中我们也不能采用因果必然性的世界观来接纳不具规律性的研究结论。实际上,经济现象是无穷尽的,经济学自身的历史性、动态性以及文化属性等因素的根深蒂固,经济学确不具备条件去实现绝对因果机制或纯粹规律性之稳定状态。在我们自身所在的经济世界中,依靠经验的累积、形式化的完备、知识的丰富都不能得出必然推论。因此,通过对概念的隐喻描述以及隐喻思维的使用,可以使我们对经济世界的本质及运行法则不断加以接近,更加透彻的言说通过隐喻潜能的释出才会更加富有意义乃至真理性。

二 经济学隐喻作为历史活动的实践

如果我们将经济学隐喻视为一种实践的可行方式,有关此种实践自身与历史关系的探讨,或者说,为什么要对该实践方式进行历史性的考察,这需要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进行阐释。角度一,经济学隐喻的实践运用要立足于传统。传统不能是一种理性的简单替代品,这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的一个基本态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哲学继承了日常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精神遗产,但是,在知识获取方式所秉持的观念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却是“前近代传统的”,也就是古希腊式的,甚至是苏格拉底之前哲学家们思路上的。具体来说,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的

是笛卡尔以来主客对立的认识思路,并主张去本质、去中心,到世界的实践中去探索知识并回答问题,认为实证不能够作为理解人和社会的方式,理解人和社会始终要在传统中进行。另一方面,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典籍承载的。伽达默尔认为,我们要在人的层面研究问题的话,一个根本的工作就是解释,也就是不断地解释前人留下的文本或“经典”。在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看来,在特定的情境或者语境下对典籍加以祛蔽,其方式就是解释,因此,如何解释始终是人文科学研究的核心。进一步来看,经济学本身就是根植于社会经济关系并研究人如何决策的学科,对传统经典的解释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来说,经济学的依赖程度更深。所以,对于经济现象和经济世界内在规律的解释我们不得不回归到典籍,也就是解释传统中那些独特存在的真理性,而隐喻无疑是最具解释力的实践方式。

我们都知道,关于知识意义的解释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对于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化思想来说,知识是通过怀疑并进一步通过建构得到的。对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等人来说,知识则来自两个层面,其一,知识是被接受下来的,是被给予的。其二,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知识是批判性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与以上的认识差异颇大,他们认为事物可不可以被怀疑并不是我们事先能够规定的,任何事物被怀疑都是因为它有着特定可怀疑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抽象的怀疑,我们的怀疑都很具体,都有着具体的理由。因此,从后现代主义哲学视角来看,我们对于传统给予我们的经济学知识,其一,我们没有办法将其彻底推翻,因为我们生存在传统中,也依赖着传统。其二,我们应该对于所有传统中的经济学知识保持一种警惕,当它的缺陷隐约浮现的时候,作为经济学知识接受者的我们要敏锐地发现那些可怀疑的部分,通过隐喻指称或表征那些所谓的可怀疑之点,并且批判性地更新我们的知识。换句话说,实践中的经济学隐喻知识就如“纽拉特之船”,该实践对传统的解释与隐喻作用在典籍中的解释一样,是一个不断修正的时间进程。其三,对于经济学对象态度的批判不应该是一种整体性的,而应将其置于一个局部的、具有启发性的、连续性的隐喻表达之中。“因为我们依赖可靠的东西来修正那些不可靠的东西,但是我们依赖的那个可靠之物本身并不是永恒可靠的,在特定的语境中可靠之物可能是可疑的或者说就是可怀疑的”^[5]。

角度二 经济学隐喻在对传统解释的实践中化解了经济学“客观性危机”。一方面,客观主义始终是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信仰,基于客观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被认为是合理的、正确的研究。从另一方面来看,“客观主义神话”作为人们的一种诉求,现实经济世界无法就其给出回应。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构成,其本身就是隐喻性的存在,因为,隐喻认识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经济学本质的理解进程。

具体来说,一个经济现象出现了,对于一个当下时代的个人来说,人们可以找到种种理解经济现象的踪迹或原因,不过,无论我们列举出多少原因多少条件,都不可能是充分的原因和充分的条件。另外,对于任何经济现象乃至任何经济学的精神产品,它们的产生当然是有条件的,但是它们不可能被充分地条件化或客观化。例如,功利主义学派将人的幸福表达成数字和数字的组合,在数字运算中定义着理性“经济人”的道德追求和理想生活,这一思路如果作为实践的操作方案显然是远离真正客观的。这也就是说,经济现象并不由原因和条件决定,因为它是发生性的(Geschehen; to happen),同时经济现象还由经济世界内在要素的发展变化而产生,该诱因来自经济现象自身,而不是来自经济现象有关诸条件集合的活动。因此,从“后现代”角度来考察经济学知识客观性的话,客观性被视为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并不与经济世界动态发展的本质属性相契合。如果我们将经济学隐喻运用于实践,无论是对已有文本的解释还是新理论的建构,都可以使我们更清醒地注意到经济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另外要着重指出的是,“与其他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不同,伽达默尔在看待人文科学性质的问题上更加强调传统中语言地位的优先性”^[6]。由于其研究中所恪守的解释的哲学传统,它特别关注意义的重要性。不同于意义定位于个体意识的现象学看法,伽达默尔把意义直接定位于传统。更进一步来看,一个恰当的解释必须允许两种语境相互作用,我们既要立足于现实的社会语境和智力结构中,同时还要把文本所处的社会语境做最可能的、充分的理解。在伽达默尔看来,这就是“视域融合”。

综上所述,经济学隐喻对经济世界的呈现实践体现为一个历史性的时间进程,比如经济学隐喻中的物理学隐喻并没有被后续的生物学所否定掉。与等价物是货币这个隐喻一样,隐喻揭示了其作为纯粹经济学工具的一视同仁,因为隐喻的意义不在于

它自身,而在于实践中转化为其他事物的价值。从另一方面来说,隐喻贯穿在经济学整体的进步序列中,考察经济学隐喻的发展进程,目的并不是对局部经济学知识及其逐渐拓展的工具进行说明,也不在于寻找独立于人的那种经济世界的客观性,而是要寻求一种将传统中的文本进行解释的可能性,也就是在传统文化语境的任何细节中追逐作为主体的其经济生活意义整体的可能性。

三 经济学隐喻作为权力操作的实践

从“后现代”视角来谈经济学隐喻的实践话题,福柯对实践颇具启发性的研究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语言引向了话语。福柯有关实践着的知识即是权力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作为表征体系的话语运用上。一般来看,“‘话语’一词是个语言学概念,它的含义相对简单,即各种相互联系的书写和演讲的段落。而福柯的关注点放在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产生有意义的陈述和合规范的话语的各种规则和实践”^[7],因此,这种知识表征的意义在福柯的理论中体现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话语实践。我们知道,现代哲学转向后形成了三种对真理的理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的看法无疑是最具“攻击性”的,如果从实践角度来看则是最具建设性的,而福柯知识即权力的实践思路无疑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影响最大。具体来看,实践即权力的操作这一思路大致建立在以下三种真理观的演进基础上。其一,在分析哲学早期,哲学家希望找到一种与自然科学一样可靠的分析性的真理,这种真理原则上是属于事实层面的,并且是能够通过“挖掘”而得出的。其二,在解释学传统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这种事实上的真理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关注的是意义上的真理。另外这种真理不是结果意义上的,也不存在现成的可以拿来使用的结论,此种真理是一个过程,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是一个不断治疗的过程,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一个不断祛除“蒙蔽”的过程,而祛蔽过程本身就是真理。其三,在库恩和福柯那里,以上两种真理都是不存在的,并认为话语权的争夺即是真理。但是,此种权力观内在具有一种困难,具体来看,这种真理观是以真理式断言给出的,然而此种表达形式并不具有真理性,因为它看上去更像一种新的争夺话语权的策略,这也是批评者对这种真理观进行攻击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对于我们从实践角度来探讨经济学隐喻来说,福柯的思路对我们的研究无疑是最具启示性的。当然这并不仅仅局限于“争夺话语

权”的观点,还有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科学知识即权力”等观点。

首先,“后现代”视域中经济学知识的真理性内涵。研究者的精确化认识或者证明经济学是理性的诉求,贯穿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主流经济学刻意把自己装扮成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和价值中立的科学,并把形式逻辑越严谨、数学化程度越高的理论越视为是‘科学’的,从而导致了数理经济学的急速膨胀”^[8]。通过研究经济学知识的演化路径我们发现,关于经济学知识观念的形成与哲学史中知识的理性探讨高度相关,与此不同的是,真理性知识及其实践有效性始终是经济学哲学研究回避不掉的问题。受到实践解释学的影响,经济学领域并不存在整体上与我们对经济世界认识相脱离的事实世界。但是哲学发展到“后现代”后,哲学不再拥有曾经具备的那种真理性了,在福柯眼里哲学已经不再提供完善的、整体性的世界图景了,哲学的结构和细节也无需理性的检验,理论研究所追求的真理事实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从经济学知识的确定性出发,无论数理经济学的推理有多严密,最终也仅证明了“抽象”而已,并没能说明不确定的客观经济世界。但是,假如从实践角度出发,人类主体就成了核心概念,由此,一幅更具真理性的本体论图景呈现出来。

在实践研究中,随着我们对对象知识的理解不断深入,隐喻在维持知识真理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这是因为,“隐喻不仅对于我们发现可观察经济行为及其潜在生成机制的初始概念化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我们在得到和发展这些机制的知识以及提炼这些知识的过程中,隐喻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9]。如此看来,经济学知识真理性的获得是将隐喻一般性认识原则运用到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具体说明和解释中,在实践的操作中,运用特定的、局部的、连续性的隐喻实践(指称、表征、意向性等功能的发挥)来达成对动态经济世界的解释。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者运用隐喻解释的逼真度,在经济真理展开的过程中,从事了一种对隐喻所表征的内容具有历史性的解释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中的经济学隐喻必然是解释性的,其一般目标就是从本体与喻体之间的解释相互适用开始,进而通过描述性隐喻的运用,实现研究主体与不止于作为对象的经济世界相适应,甚至在实践中还实现了对目标的否定和超出。

其次,经济学隐喻的实践属性内在于自身,其有关“真”的追求是权力追求中最根本的一类。实践

的意义是不能脱离实践来谈的,经济学隐喻实践是由这种活动自身的可能性规定的,事先谁也不清楚一个经济现象的成因与关于经济世界的隐喻实践会取得什么样的联系。进一步说,对经济学隐喻的观念不能强加于他人,因为实践呈现出的实践价值事先是不能确定的,也没有一种外部的目的和准则来束缚经济学隐喻的作用。此外,从不同思想来源中探究经济学隐喻实践的理由和目的,理由和目的本身也被实践同步地改变了。后现代主义哲学这种反基础主义、反对主客分离的思路给我们研究经济学隐喻所形成的启发是根本性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在实践之外规定实践的目的。我们从实践角度看经济学隐喻,它已不再是一种语言现象、修辞手法或语言游戏,或者人们利用一事物对另一事物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隐喻已经渐变为经济学研究者思维和话语实践“赖以存在的基本方式”。

从本体论视角来看,实践中的“是”相当于存在的“是”。在经济解释的语境下,这个存在也可以理解为“是”之争,而且永远是在什么事物真正“是”、什么事物实际“是”、什么事物只是假象“是”这三个层面进行争夺。举例来说,经济学隐喻通常用“是”进行陈述,与经济世界中的存在一样,经济学隐喻中S是P这个“是”并不是一个肯定的表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否定的表达。当我们说,资本是生产资料的总和,以及供给曲线(supply curve)是以几何图形表示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时,我们永远是针对建构而来的经济世界中的某种假象在说“是”。经济学隐喻中的“是”本身就是一种争夺,这个“是”是针对某种假象的一种争夺,这种针对“是”的争夺就是在争夺谁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更具意义。换言之,由于经济学从根本上是被建构的,加之经济学隐喻的功能属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谁的隐喻解释更具意义谁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经济世界尤其是在经济生活语境中,有关“是”的争论比狭义权力的争论重要得多,这无关乎是主体人或是经济人。经济学研究和经济生活是否有意义,其核心就是争夺谁的研究是真正有意义的研究,谁在社会经济中的生活是一种真正的现实生活,这才是经济主体或经济人真正在争论或追求的答案。总之,在大部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那里,“是”什么是指真正是什么,有关社会存在的问题即是“真”之问题。因此,我们探讨经济学隐喻的实践意义,对“是”之解释权的争夺是不能回避的。

最后,经济学隐喻之于实践的权力属性。其一,

“后现代”哲学真理观是对解释学和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真理观的超越。解释学和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告诉我们,真理不是一个数学公式,不具备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更不是可以通过逻辑推导而获得的。在经济学中,隐喻的真理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渗透性。也就是说,某一隐喻典范对于某类事物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此种隐喻的真理性是就真理如何起作用来谈论的,作用也是有远近不同的。这种此在存在的真理来自实践着的隐喻,其在有些事物上作用巨大,而在有些事物上作用则不够显著。我们理解存在,这构成了我们存在的部分本质,而理解我们人本身的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同样是真理。真理的追求不是部分人的使命,对于真理的追求是属于人类此在生存中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并没有所谓“真理”,“真理”是就其如何运用与智性治疗的过程。从福柯视角来看,真正对哲学重要的事情是存在之争,且其中暗含了权力之争。不过,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实践者来说,真理不是一个虚构,而是研究活动和社会经济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其二,经济学隐喻实践的实质——经济学知识即权力。尼采认为“就知识一词有意义的范围来说,世界是可认知的;但知识也可以用不同方式解释。它不是蕴含着一种意义,而是无数意义”^[10]。尼采的根据是:理性根本上是历史的,理性不是自己的理由,理性是历史地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现代区分是理性权力运作的结果。福柯认为,不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知识、真理或方法,知识更多体现了话语的隐秘的运作,以及话语或语言自身游戏的产物。因此他主张,认知主体和对象都是权力/知识这一复合物的产物,权力和知识互相产生,并非彼此外在,由此他提出了“微观权力”这一概念。如果说经济学隐喻实践包含权力关系,并且有效地运用了权力,就是在说社会经济语境中隐喻通过某种有意义的实践规定了研究者可能的活动,这种权力与福柯认为“规训”的实践技术能力颇为相似。

劳斯继承并发展了福柯的权力理论,他把权力定义为“对事物成功操作的力量”。劳斯认为,“传统的观点是把知识成果与其随后的应用区分开,这样,权力被看作是知识的应用。因为新经验主义者把知识从精确的表象转变到对事物的成功操作和控

制上来,所以在他们看来,上述区分不能成立,权力不再外在于知识或与知识相对立,权力成了知识的标志”^[11]。因此,“科学不在于提高我们对事物表象的精确性,关键是提高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技术控制,即介入和操纵事物的能力,不应看成是对先前知识的应用,而应看成是当今科学知识的主要特征”^{[11]213-214}。如果我们将经济学隐喻性知识的实践视为权力,这对于我们理解经济主体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来说,价值无疑是巨大的。犹如尼采所强调的权力意志(macht^①),对于谁的研究是真正的研究,谁的生活是真正的生活,这要求我们要充分理解研究的现实状况和人的生存状态。从这一思路来理解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知识的真理就不再是神话了,而是通过隐喻实践潜能的呈现来展开自身权力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研究者借助于隐喻的种种形式将其研究的真理性不断地阐发出来。因此,这种真理性不再是简单地与事实相符合,更体现为经济学研究者是否在从事真正的研究,他们是否在过一种真正的生活。换言之,此种“真”体现为经济学隐喻实践者对不确定性存在的真理性追逐、体现为他们对自身能力和处境的清醒、体现为他们对现实经济世界所保有的真诚态度。

结 语

实践中的经济学隐喻,既体现出人对自身生存方式的理解,同时还记录了这种理解的不断进步。再者,有关不确定性问题如何应对的讨论从未停歇,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在目前所能得到的结论中也难以让它获得数学意义上的精确性和必然性。因此,如果从“后现代”视角出发,在实践中对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加以理解和领会,虽然作为“工具”的经济学隐喻不能给出确定的回答,但是通过主体人的理解,将经济学隐喻的认识和实践统一,让经济学隐喻的解释力在实践中逐渐释出,并阐发出其中的真理性,也许这并不是不确定性问题的解,但这一思路或许是根本性的。简言之,只要身处经济学隐喻的实践进程中,这无疑可以使我们对经济世界本质和意义的领会得到深化。

【参 考 文 献】

[1] LAWSON T. Economics and reality [M]. London: Rout-

① 该词是指崛起中的权力,强权之意,也可以说是一个有充分能力的事物在崛起。从本质上是讲,macht强调一种潜能的全部展现。

- ledge, 1997: 14.
- [2] 格莱姆齐. 决策不确定性和大脑: 神经经济学[M]. 贺京同,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58.
- [3] 利科. 历史与真相[M]. 姜志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22.
- [4] CARTWRIGHT N. Nature's capacities and their measurement [M]. Oxford: Clarendon, 1989: 181.
- [5] 维特根斯坦: 作为治疗的哲学 [EB/OL]. (2015 - 05 - 08) [2018 - 12 - 09].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75060861/>.
- [6] TRIGG R. Understanding social science: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 [M].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219.
- [7] 霍尔. 表征: 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 [M]. 徐亮, 陆兴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64.
- [8] 朱富强. 实证经济学是一门客观性学科吗?: 实证分析中主观性和规范性探微 [J]. 北京: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9(1): 147.
- [9] LEWIS P. Essays on metaphor and realism in economics [D].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7: 6.
- [10] 尼采. 权力意志: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M]. 张念东,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648.
- [11] ROUSE J. Knowledge and power: 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19.

A Postmodern Study on the Rationality of Economic Metaphor Practice

QI Da - wei

(Research Centre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Shanxi University , Taiyuan 030006 , China)

Abstract: The “uncertainty problem” has long plagu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The application of economic metaphor to practice, with its interpretability, not only reveals the truth of the economic world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uncertainty problem”, but also shows the progress of economic researchers’ pursuit of the truth of knowledge. The post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actical superiority of economic metaphor can not only be regarded as a solution to the “objectivity crisis”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research, but als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ssible prospects of economic research.

Key words: economic metaphor; postmodern philosophy; interpretation; truth

(责任编辑 魏屹东)